



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毛泽东确定的党的七大工作方针

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开成这样的大会，与毛泽东确定的党的七大工作方针直接相关。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专门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为题作了讲话。

□ 倪德刚

开好大会的两个方针

怎样开好七大，或者说开好七大的方针是什么，这是毛泽东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说：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这就是开好七大的方针。方针必须有针对性、有方向地指导事物的发展。他解释说：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毛泽东强调：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指出，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大会为什么要向前看，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呢？毛泽东讲了一段自然界进化史，又讲了一段社会发展史。关于自然进化史，他说，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关

于社会发展史，毛泽东说，人类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

不要骄傲急躁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

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要保持谦虚。在我们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

毛泽东讲了一个唐朝的典故告诫全党。他说，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

“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写的话剧《前线》中的一个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的名字）。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他还举三个当时延安工农兵代表人物的名字：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他提醒大家：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我们共产党员，到哪个地方就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方法

错误，应该全面、历史地评价，引导他正确认识自己的问题，激励他克服缺点和错误。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无论批评别人，还是批评自己，对问题的性质和错误程度，要进行合乎实际的分析，把握好度。

坚持党性，出于公心

能否有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说到底是个党性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

坚持党性，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以中国最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只有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才能大胆公正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坚持党性，要做到讲真理，不讲面子。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讲真理，就是要围绕大是大非问题，即党性原则、理想信念、廉洁自律等方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共产党员尽心尽力为党和人民工作，也难免会犯错误，但是只要自己襟怀坦白，勇于自我批评，下决心改正，就不会掉“面子”。

坚持党性，要求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出于公心。出于公心，就是要公正、公道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否则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列宁指出：“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根据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的态度。”只有出于公心开展批评，才能避免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在批评中不带有任何偏见，不掺杂任何私心、不裹挟任何私欲、不搭载任何私人企图。

与人为善，团结同志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批评必须出于公心，不主

观武断，不发泄私愤。”本着对党、对同事负责的态度，善意地、真诚地指出他人的缺点和错误。坚持以诚待人，通过真心实意、诚心诚意沟通思想，达到真正把关心、关爱送给被批评者。

与人为善，就要把开展批评的出发点切实放在帮助同志上。批评是从党内同志的健康成长、积极进步之需要出发，而不是借机“出气”，整和自己意见相左、“不听话”的人。只有批评者充满真情关怀，被批评者才能是如沐春风。当前之所以在一些基层党组织批评难以开展，就在于开展批评没有做到与人为善，批评别人暴风骤雨，力求将其“打倒”而快之。这样的批评，伤害同志影响团结，根本达不到党内批评的目的，甚至会增加矛盾和隔阂。

与人为善，就要坚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手段，离开了团结这个出发点，批评就失去了积极意义。只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才能对同志采取关心爱护的态度开展批评。坚持与人为善、团结同志，要防止只讲“团结”不讲批评、取消党内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也要防止只讲批评不讲团结的过火斗争。

给人自尊，注意方式

古人曰：闻过则喜。这是一种十分高的思想境界，普通群众往往达不到这种境界，党员干部也不例外，对批评常常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如何让批评容易接受，关键在于批评时注意方式方法，不要伤害被批评者的自尊心。

自尊心人皆有之。自尊心是尊重自己，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容许别人侮辱和歧视的心理状态。自尊心是人积极向上，努力克服缺点的内部动力。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如果伤害了对方的自尊心，就会使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产生对立情绪。只有当被批评者把批评看成是自己的需要且乐于接受时，批评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因此，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要营造相互尊重的氛围，保护被批评者的自尊心，把自尊心引导转化为自我批评的动力，使被批评者乐于接受意见。要以尊重人格为前提，采取民主平等的态度，选择有效的批评方法，如采取讨论式、提问式、鼓励式等多种方式，以达到更好的批评效果。

1958年7月，朱德和随行人员到兰州五泉山考察，途中看到一座牌坊，牌坊上正书：“高处何如低处好”，后书：“下去还比上来难”。朱德感慨道：“古人把‘下去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朱德一贯十分重视“下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可以说伴随一生，受益一生。

通过对国情世情的深入调查，朱德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早年，朱德在旧军队带兵打仗时，战前“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他曾说：“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这种良好习惯，使他经常能打胜仗，“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突出的战绩让朱德很快成为滇军著名的将领。后来，朱德到德国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解详细情况，“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通过对德国的深入了解，朱德“认清中国革命问题是与国际问题相连的，而且了解到革命决不是某一块地方的事情”，开阔了视野，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追求和选择。从德国到苏联后，朱德继续保持了这一好习惯。他在莫斯科学习时，常常深入农村和基层，跑了不少地方。用朱德自己的话说：“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时，更把中国的事看通了。”在苏联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将其确定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的调查，朱德提出了“南泥湾屯田政策”。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处境十分困难。朱德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情况。他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和从事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负责人一起到各地视察工、农、商各行业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1940年10月，朱德先后发

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完成1941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阐述他对发展边区经济的构想。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粮食困难问题，1940年，朱德、董必武等到南泥湾临镇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提出了南泥湾屯田政策。李维汉回忆道：“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一片荒凉的“烂泥湾”变成了“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屑”（朱德所作的诗）的陕北“好江南”。“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通过对东北农村农民问题的调查，朱德力请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新中国成立后，曾指挥千军万马的朱德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下去调研，体察民情民意。据统计，从1956年至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近90天，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但是，当时有些进城干部并不像朱德那样，重视调查研究，“下去”倾听民意，了解民情，而是想当然地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这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做法严重侵蚀着领导干部和党的威信。对此，朱德曾严厉指出：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当然，从朱德“下去”的经历看，在那个年代里，“下去”的确很难，这不仅仅体现在难听到真话，还体现在了解到实情后所带来的风险。“大跃进”开始时，朱德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他逐渐发现了问题，便挺身而出，主动“下去”了解真相。1959年5月，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就农业问题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后，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分析多数群众不愿意长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的具体原因，并力请解散农村公共食堂。为此，他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但后来的历史很快证明，解散公共食堂是正确的！